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物品赏赐

滕德永

【内容提要】清代帝后万寿期间，其赏赐活动非常频繁。这一活动起源很早，入关之前即已形成制度，入关之后则又不断发展。其赏赐物品包括大量的白银、缎匹，还有各种宫中物品，诸如荷包、火镰、梳具等。万寿期间的物品赏赐，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其受赏人员因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此外，其赏赐的物品还有性别差异，女性受赏物品与男性各有不同。这些赏赐物品中，部分为东北等省份进献的贡品，诸如人参、貂皮、茶叶等；较大部分为清宫造办处制作寿意活计，还有部分为清宫所属机构——江南三织造和景德镇御窑厂置办。总之，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物品赏赐是清代赏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展现形式，同时，它亦是有清一代君臣联系交往的重要方式，与君臣诗歌唱和等活动共同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关键词：万寿　赏赐　制度

Bestowing Rewards During the Imperial Birthday Celebrations

Teng Deyong

Abstract: During the Vast Longevity (*wanshou*) Festivals celebrating the birthdays of Qing emperors and empresses, the bestowing of rewards increased. The origins of the reward syste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eriod before the Qing troops entered Ming territory through Shanhaiguan, and it continued to develop over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rewards themselves consisted of a large quantity of silver ingots and satin goods,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objects for palace use such as pouches, steel flints, and combs. Different items were granted to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social status, vividly reflecting a sense of hierarchy. In addition, the rewarded items also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recipient's gender. Some items, including ginseng, marten, and tea, came from tributes paid to the court by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e ancestral homeland of the Qing), while a large number were manufactured at the court's Imperial Workshops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celebrating imperial birthdays. The rest were arranged by organizations which were subsidiary to the palace including the three Jiangnan Silk Factories and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s. In sum, the practice of bestowing rewards during the Vast Longevity Festival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ing system of rewards, and took on distinct forms during this special period. It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 and his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along with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exchanging poems, constituted the sovereign-offi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imperial era.

Keywords: the Vast Longevity Festivals, bestowing of rewards, system

万寿节是清宫的三大节日之一。节日期间，清帝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皇帝与王公大臣、少数民族领袖和外藩使节共聚一堂，欢庆万寿。其中，赏赐物品是万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赏赐情况主要散见于档案文书之中，时人所知有限。笔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及相关文书对此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以为管窥。

一　清代帝后万寿概况

早在崇德时期，万寿已经成为宫中重要的节日。崇德元年定，元日进庆贺表笺，冬至、万寿圣节进表庆贺[1]。每逢皇帝万寿，朝鲜、各臣服部落和满族王公、大臣都要有所进献。崇德二年，皇太极以此前所定万寿时王公贡献额数过多，决定从新定制。其中，皇帝万寿节时“每旗献东珠一颗，金八两，黑貂皮九张，肉牛一头，羊八只”，皇后千秋节时，各旗所进物品种类与皇帝相同，只不过具体数量上略有删减。元旦期间，每旗“献圣汗雕鞍马一匹，金七两，黑貂皮九张。皇后每旗金七两，黑貂皮七张，肉牛一头，羊八只”。此外，还规定了降服三王的进献额数，“逢圣汗万寿节，各献好貂皮九张，金九两，献皇后好貂皮七张，金七两，合献肉牛一头，羊九只”[2]。

入关后，顺治朝对关外制度进行了损益。顺治元年，定诸王贡献例。“庆贺万寿、元旦、冬至，贡鞍马、金、珠、貂皮、彩缎诸物，许各随所有以献。摄政王十八件，辅政王九件，和硕亲王六件，多罗郡王三件，平西王三件，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二件。多罗贝勒以下免其贡献。”[3]顺治八年，又定万寿等三大节礼仪[4]。

至康熙时期，清代帝后万寿的庆祝方式有了极大的变化。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九年，先后庆祝皇太后六旬、七旬万寿，进献丰富的礼物。更为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即位以来，清政府的统治日趋巩固。军事上，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剿灭噶尔丹等，巩固了统治，加强了边疆的管理；经济上，废除圈地令，实行“更名田”，调整垦荒政策，蠲免赋税，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加，至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国人口达到 9800 多万[5]。这一切都令康熙皇帝深感自豪[6]。 因此，面对王公大臣们纷纷奏请兴办祝寿庆典，康熙皇帝欣然允诺，且要隆庆。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隆重举办了六旬万寿庆典。后又汇编《万寿盛典初集》，绘制《万寿图》卷。

至雍正时，因为雍正皇帝未至六旬即崩逝，未得以隆庆。至乾隆朝，不仅其本人寿高八十九，而且其母崇庆皇太后亦寿至八十六。并且乾隆皇

帝侍母极孝，分别于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为其隆办万寿庆典。乾隆本人亦隆重庆祝其八旬万寿。且效法乃祖康熙，在御路两侧布设点景，以为帝后观瞻。万寿之后，更皆绘制《万寿图》卷。

嘉庆皇帝继位后，虽然国内问题重重，但至二十四年仍然举办六旬庆典，其庆祝方式延用乾隆模式，布设点景，但未绘制图卷。这或许与其早逝有关。嘉庆的继任者道光皇帝，曾于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年先后为恭慈皇太后举办六旬、七旬万寿庆典，但其六旬万寿之际，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谕令“毋庸举行告祭礼，所有升殿筵宴均着停止，仍照常恭请皇太后宫行礼，后升正大光明殿受贺”[7]。

咸丰以后诸帝寿命皆短，其万寿都未隆庆，但慈禧皇太后则寿至古稀，曾先后隆办其六旬与七旬万寿。尤其是其六旬之际，慈禧皇太后更是要效法乾隆及崇庆，要按照其规制办理万寿，后虽因甲午战败，其庆典活动被迫终止，但花费实多，仅借拨户部银两即多达 280 余万两[8]。据学者研究，其实际支出则多达千万两[9]。在此期间，慈禧皇太后亦多次为其庆祝万寿。

清代帝后万寿期间，各地督抚、休致官员、宗教领袖、边疆少数民族王公、外藩使节，还有各地的耆老寿妇，同赴京城，共襄盛典。在此期间，清代帝后对其亦恩宠有加，赏赐不断，以为庆贺。

二　万寿期间赏赐物品的构成

清代帝后万寿期间赏赐群臣的定例起源于入关前。崇德二年，皇太极规定了万寿时王公大臣进献的物品及回赐的品类与数额。其中，赐内旗王、贝勒、贝子等各银 300 两；赐外藩诸王、贝勒、贝子等，每旗无论甲胄、雕鞍皆一副，又插弓箭撒袋一副、蟒缎一疋、缎四疋，佛头青布五十疋；赐汉三王各马二匹、银 200 两[10]。入关后，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物品更加丰富，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缎疋。这是帝后万寿赏赐的大项，乾隆皇帝八旬万寿时，仅此一项即多达 8000 余疋[11]。其缎疋又可细分为缎、绸、纱、漳绒等，并且宫中对其又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有的根据地域，有的根据使用对象，有的则根据纹饰。如宫中所称上用缎，其中，因为受赏人员身份的不同，其所得缎疋亦有不同。上用缎即是按照使用对象划分，它主要是皇帝应用，规格较高。内廷将上用缎又可分为上用金字缎、上用二则缎和上用素缎，此种缎疋主要赏给地位崇高的官员。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时，即赏给接驾的年满七十岁以上的九老、亲王等。此外，亦有倭缎、宫绸、漳绒等物[12]。当然，有时皇帝亦会将其特赏地位较低的人员。崇庆皇太后五旬万寿时，乾隆皇帝即谕令特赏，“百岁老妇每人加赏上用缎二疋，九十岁以上官员、有品级太监每人加赏上用缎二疋，八十岁以上官员、有品级太监每人加赏上用缎一疋”[13]。至于大缎、帽缎、彭缎、绸、纺丝等物则主要用于赏赐来朝的各国贡使。根据清制，帝后万寿时一些藩属国亦要派遣使节入朝朝贺。他们入朝之际都会携带大量的贡品，清代帝后亦会回赐给相应的物品。这其中尤以朝鲜为重。早在崇德二年，皇太极即对朝鲜的万寿贡品及赏赐物品有明确规定。至顺治时期，清帝赏赐朝鲜贡使的物品有较大变化——增添了缎疋。这是因为在入关前，清朝的物资较为紧张，不敷内用，至入关后，这种紧张局面得到极大缓解，有能力增加赏赐。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清帝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人，天下皆归其有，增加赏赐物品方可显示其崇高地位。顺治十年，朝鲜来贺万寿圣节，除各项例赏外，清帝还赐正副使大缎、帽缎、彭缎、绸、纺丝各一疋，书状官大缎、彭缎、绸各一疋，大通官三人，各大缎一疋，绸一疋，押物官二十有四人，各彭缎一疋，绸一疋，银二十两[14]。此后，清帝万寿期间对朝鲜的赏赐基本相同，缎疋成为赏赐物品重要组成部分。

除朝鲜外，其他各国亦皆有赏赐，缎疋亦充斥其中。乾隆八旬万寿期间，除赏赐安南国王阮光平蟒缎、妆缎等共 127 疋外，还赏其使臣缎绸等 690 疋，布 695 疋。赏赐缅甸国王蟒缎、妆缎等共 180 疋，其使臣缎、绢、绸等 224 疋，布 156 疋。赏赐南掌国王蟒缎、妆缎等共 86 疋，其使臣缎、绢、绸等 124 疋，布 102 疋[15]。

对于来朝祝贺万寿的宗教领袖与少数民族首脑，其所进贡品甚多，清代皇帝亦对其进行折赏。缎疋即是折赏的最为重要的物品之一。嘉庆二十四年，清帝折赏给达赖、班禅等藏地领袖的绸缎多达 700 余疋[16]，折赏给土司的绸缎为 210 疋[17]。

其二，成衣。成衣主要赏赐较为特殊的人群。为庆祝康熙六旬万寿，全国各地的耆老寿妇梯山航海，汇聚京城。对于他们的到来，康熙皇帝非常高兴，不仅非常关注其身体健康状况，还特别赏赐其中的部分耆老黄色袍褂。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为办理其母七旬万寿，曾一次置办明黄对襟寿妇褂 800 件[18]，即为赏赐之用。

若值天气寒冷之际，对那些来自地处温热地区的各国使臣，清朝皇帝即会赏赐皮袄、棉袄等物，以御寒保暖。嘉庆二十四年，暹罗、南掌、越南使臣来朝，恭祝皇帝六旬万寿。经内务府奏请后，嘉庆皇帝谕允，照例赏赐暹罗、南掌、越南使臣等共计 70 人，每人皮袄、棉袄、靴袜各一份[19]。

其三，荷包。这是清代帝后赏赐的最为普遍的物品。荷包是满族的一种重要佩饰，逢年过节，或有各种喜事，满族都有送荷包的习俗，以祝愿吉祥平安。清宫亦延续了这一传统，在帝后万寿之际，清代帝后都会赏赐大量荷包。乾隆八旬万寿时，共赏赐王公大臣、各国使臣等大小荷包 960 余对。

这些荷包亦有等级之分。其中金黄辫花荷包多赏赐于王公，蓝辫花

荷包则可赏位高权重的文武大臣，素荷包、花荷包则多赏赐其他官员。一般而言，地位崇高者在得赏高等级的荷包时，亦会配有低级别的荷包，但官职级别较低者，只能得赏低等级的荷包。

荷包有大小之分，清代帝后的赏赐以小荷包为主。大荷包多成对赏赐，且多仅为一对，而小荷包则按个数赏赐，少则 1 个，多则 5 至 6 个。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时，共赏赐大荷包 295 对，小荷包 737 个[20]。在赏赐之时，男性成员既可赏赐大荷包，又可赏赐小荷包，而女性成员仅赏赐小荷包。

其四，如意。这是清代帝后赏赐的又一重要物品。明清之际，如意是重要的吉祥物品之一。清代帝王对其尤其推崇。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年节王大臣呈进如意，取兆吉祥之义也，自雍正年间举行”[21]。约至乾隆时期，如意成为最为重要的贡品之一，且多列于贡品的首位。不仅如此，清代帝后万寿期间，亦多将其赏赐臣工。据不完全统计，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时，赏赐臣工等如意 300 余柄，乾隆皇帝八旬万寿时，赏赐王公大臣、使臣等如意 250 柄。

当然，这些如意的赏赐亦有区别。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帝后万寿期间的例赏如意，其记载较为简单，只是记录赏赐的数量，并不详细叙述其形制，但若是加赏的如意，则会详细记录如意的形制。如崇庆八旬万寿时，对九老人等予以加赏，其如意则明确为紫檀嵌玉如意。而且，如意的赏赐亦并非普及至所有人，只有地位尊崇者方有此等权利。

一般地，每人每次只能受赏一柄如意，但若该人多次受赏，其亦可再次得赏如意。乾隆八旬万寿时，安南国王亲自来朝祝贺，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对其叠加赏赐。其中，仅如意就赏赐 4 柄。其中一柄受赐于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一柄受赐于七月十二日，一柄受赐于七月十七日[22]，此三柄的赏赐地点在避暑山庄。至于第四柄则未见诸记载。

其五，化妆品。在参加万寿——尤其是皇太后万寿的人员中，女性人员占有一定比例，她们主要是皇族女眷及王公大臣的妻室。对于她们的到来，清代帝后准备了丰富的物品。除绸缎外，还有胭脂、梳具、宫粉、包头、手炉、念珠等物品。

其六，银两。银两主要赏赐于参加祝寿的低级人员。这些人员主要包括耆老寿妇、念经喇嘛、杂耍艺人等。这种赏赐始于康熙时期。康熙五旬万寿时，曾经赏赉八旗年老人等。崇庆皇太后五旬万寿时，亦效法康熙，赏赐在畅春园至紫禁城御路两侧接驾的、年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7.07 万余名，共用银 10.8 万余两[23]。杂耍艺人主要在万寿点景处表演节目，以为娱乐。乾隆八旬万寿时，仅供应此项的戏曲人员即有 6000 余人。其中京城戏曲人等共 3265 名，两淮戏曲人等共 2162 名，浙江戏曲人等 875 名。仅此一项，乾隆皇帝即赏赐银 6300 余两[24]。至于念经喇嘛则是为了帝后祈福，皇帝亦多有赏赐。崇庆八旬万寿时，赏赐正觉寺念经喇嘛银 1000 两，赏赐万寿寺念经和尚银 1000 两[25]。此外，对于外藩使臣等人亦有赏银，其赏赐数目亦有定例，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其他物品。清代帝后万寿期间赏赐的物品还有很多，涉及御笔书画、朝珠、笔墨、砚台、瓷器、漆器、玉器、玻璃器、象牙制品等诸多门类，这些物品数量较多。乾隆八旬万寿时，即赏赐此类物品 3360 余件[26]。其中，以鼻烟壶、火镰为多。除一些王公大臣外，外藩使节及少数民族领袖、随从人员等，几乎每人皆有此种赏项。此外，由于他们皆远道而来，清帝还赏赐他们大量茶叶，且为了便于饮用，赏赐他们的瓷、漆、象牙等杯盘，多为茶具。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六旬万寿时，曾将为数甚多的文房用具赏赐于王公大臣等，至乾隆时期，这种赏赐渐少。这或许因为康熙皇帝要求官员勤加学习，以更好地治理地方，而乾隆时期，国泰民安，物阜民丰，乾隆皇帝本人文治武功，超越古人，对学习的欲望降低，对官员的这种诉求亦趋弱化。

总之，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频繁，惠及人员众多，既昭显了皇恩浩荡，又展现了大清帝国的雄厚国力。它将万寿庆典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三　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物品的赏赐程序

清代礼制森严，与皇帝相关的诸事宜皆有一定的礼仪，所以，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亦有完善的程序。当然，对于不同身份的受赏人员，其程序也有差异。

对于外藩使节的赏赐，《大清会典》有明确规定：“颁赏之日，豫设案于午门外道左，陈赐物于案。馆卿朝服，率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由东长安门天安门端门，至西朝房前东面序立。礼部堂官一员，立案北，西面。主客司官及各执事员役，俱立案南，西面。监礼御史及鸿胪寺鸣赞官四员，分立御道左右，东西面。序班二员立贡使之北，东面。均朝服。鸣赞赞齐班，序班引贡使至西丹墀内序立，北面东上。赞进，赞跪叩兴，行三跪九叩礼。主客司官奉颁给国王赐物，率通事授贡使跪受，转授从人，乃以次颁贡使从人赐物，各跪受讫，赞叩兴，复行三跪九叩礼，兴。引退，馆卿率贡使及从官从人皆出。”[27]

其实，这只是赏赐当日的礼仪，至于具体的赏赐物品并无涉及。这只能从相关的档案文书中窥其大概。一般而言，对于外藩使节的赏赐，清代制度已有规定，但这种规定经常发生变化。在赏赐之前，皇帝会令礼部等官员查照以往成例，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再奏闻皇帝。若无特殊情况，基本上会按照礼部等官拟订的方案赏赐。不过，清代帝王经常会做出调整。乾隆八旬万寿时，礼部等官初步拟定赏赐安南的物品后，乾隆皇帝因该国国王阮光平亲赴宫阙祝寿，且其八旬万寿为前朝所无，旷世

盛典，为此加赏阮光平及陪从人员各种物品甚多[28]。

除此定例赏项之外，清代帝后还时有赏赐。这主要是对王公大臣的赏赐。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大宴群臣七次[29]。至七月十七日筵宴，皇帝赏赐与宴王公大臣、使节人等。朝鲜使节对赏赐程序记之甚详，“每品应受各种分盛于黄函，书每员爵秩、姓名于粉牌，牌长七寸，广二寸，厚二分，首刻莲叶，绿漆，下皆粉漆，置函中，列函于东西，序阶上。和珅按牌呼名，立阶下授之。诸臣跪受，一叩后还班”。此次朝鲜正副使各受赐“缎五疋，荷包三支，鼻烟壶一个，漆碗一个”，书状官“缎四疋，荷包二支，鼻烟壶一个，漆碗一个”[30]。七月十九日筵宴之后，使臣陪同皇帝观戏，“止戏前，阁老和珅领钦赐各种，颁于参宴诸臣”，朝鲜正副使“磁瓶一个，磁碗一个，磁碟一个，象牙茶盘一个”，书状官“磁碗一个，磁碟一个，象牙茶盘一个”[31]。

当然，这种赏赐有别于例赏。其赏赐物品的确定无章可循，但亦是由乾隆皇帝事先降旨，再由负责办理乾隆八旬万寿事宜的大臣拟定赏赐的物品种类，奏闻皇帝后，经皇帝损益，在既定的场合进行颁赏。在此过程中，受赏人员的地位高低是赏赐物品的种类、品质的先决条件。

此外，还有一种面向大众人员的赏赐。这种赏赐因所需物品数量大，涉及人员较广，其赏赐程序亦与以上二种有异。如在自畅春园至紫禁城之间，御辇所经之路两侧皆有维护秩序的官兵及各项艺人，清代帝后为其准备了大量的饽饽。其赏赐程序非常简单，多是皇帝的一道谕令即可决定。

四　清代帝后万寿期间赏赐物品的来源

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物品品类繁多，数量巨大，这是对内务府财力的一大考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其物品来源呈现多样化。

贡品。在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物品中，有些为宫中特有。其中，貂皮和人参是其代表。清代统治者肇兴东北地区，他们对东北的人参和貂皮感情深厚。入主中原后，清代皇帝逐步垄断了对东北人参、貂皮的采捕，由此，大量貂皮和人参贡入宫中。赏赐是宫中消耗的重要方式之一。清代帝后万寿期间，赏赐貂皮制度发端于入关之前。早在崇德二年，皇太极明确规定了朝鲜万寿来贡时赏赐物品，内有赏赐国王的貂皮 120 张，其他人等貂皮 191 张[32]。此后，这一制度为历代清帝所延续。至于人参，用于赏赐的数量不多。乾隆八旬万寿时，曾赏赐蔡新人参 1 斤[33]。

在赏赐的物品之中，茶叶亦是重要的贡品。清代帝后万寿时，筵宴、召见王公大臣，多有赐茶，此外，还赏赐各国使臣等各种贡茶。乾隆皇帝曾赏赐阮光平大团茶 2 个，普洱茶膏 2 匣。对于其他各国使臣及各少数民族领袖亦多有此类赏赐。

乾隆年间，崇庆皇太后万寿大庆时，王公等还进献了 810 份饽饽桌。饽饽是满族的各种点心。对于这些饽饽桌，经内务府向皇帝请示，将其中的近支宗室呈进的 9 桌交内外，其余 801 桌皆赏赐于畅春园至西华门一带备差官兵、各项杂耍艺人等[34]。

内务府制办。清代帝后的万寿，尤其是六旬等逢旬大寿，多提前一二年即开始筹办，宫中为此制作了数量众多的寿意活计，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赏赐。万寿期间，内务府亦根据需要，临时制作了大量赏赐物品。前文所谈及的赏赐耆老的成衣 800 件，为内务府临时措置。在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时，内务府备办赏赐如意 1000 柄、瓷瓶 500 件、朝珠 840 挂、铜手炉 1500 个、黄盘 300 个等等，共用银 34312 两[35]。

在内务府备办的赏赐物品中，书籍也是其大项。乾隆八旬万寿时，曾一次发下《万寿衢歌乐章》100 部，分赏阿哥、王公大臣等，每人一部[36]。而在一些赏赐之中，亦经常有诗册、绘画。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乾隆赏赐两淮、两浙、长芦盐商 47 名，皆赏给《九老会诗》，其中的 12 人还加赏《耕织图》诗画各一份[37]。

除内务府直接筹办外，一些特殊的物品只能交付京外的御作机构——江南三织造和景德镇御窑厂。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之际，内务府备办各种缎疋，其中香色丈带花大荷包 4000 对，各色蟒缎、八五丝缎 4000 正，用银 115406 两；各色大小卷缎绸纺丝 5675 疋，用银 10 万余两，各色袍料 200 余件、手巾 1000 条、包头 1000 块，共用银 43200 余两[38]。而慈禧皇太后七旬万寿之际，景德镇置办万寿用瓷 46000 余件[39]，此内有相当数量的瓷器为赏赐之用。

户部等。乾隆中期以前，内务府收入有限，对户部财政颇为依赖。康熙六旬万寿之际，曾经广泛赏赐耆老银两。其中，“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及内扎萨克、喀尔喀等蒙古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者分别赏赍，至百岁者题明给与建坊银两”，共用银 26700 余两，取资户部[40]。而崇庆皇太后五旬万寿时，其赏赐八旗耆老、官员、兵丁、太监等人，共用银 108750 两，布 69738 疋[41]，皆支用户部库存。至慈禧皇太后万寿时，内务府财源枯竭，各项差使皆依赖户部拨款，此项赏银更取自于此。

除此以外，其赏赐物品还有其他一些来源，但这些来源并非常态，而是偶有为之，不足为恃，不再赘述。

结语

清代是赏赐盛行的时期，其赏赐几乎无处不在，物品异常丰富。为此，清代建有专门的赏赐档案，至迟于雍正时期基本上每半月汇总一次。相对于这种日常的赏赐，清代帝后万寿期间的赏赐具有其鲜明的特点。

其一，赏赐频率大，涉及人员广。清帝日常的赏赐行为，时间间隔较长，且赏赐的对象仅为极少数人。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一至十四日恩赏卜万年等

二人，共用上用缎二疋，宁绸二疋[42]。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五至三十日赏赐巴林多罗郡王桑礼达等三人，共用银 500 两，上用缎二疋，宁绸二疋，人参 4 斤[43]。而清代帝后万寿期间，其赏赐非常频繁。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九日，安南使臣每日都有赏赐。而且受赏人员涉及各个阶层，不仅有王公大臣及其女眷、外藩使节、少数民族领袖，还有来自民间的耆老寿妇，甚至还有四民之末的豪商巨贾。

其二，赏赐物品丰富，数量多。清帝日常的赏赐物品多为绸缎、人参和貂皮等物，但清代帝后万寿期间，其赏赐的物品几乎涉及各个门类，上至御笔书画、御用器物，下至普通的生活用品、点心食物，应有尽有。从前文所述可以得知，此时清代帝后赏赐的物品数量众多，大宗物品常更是盈千累万。

当然，这种赏赐与日常赏赐最大的不同在于：日常的赏赐更多的是一种褒奖行为，是对官员政绩等的赞扬，宣扬的是社会正能量；而此时则更多的是对王公大臣热烈庆祝万寿的呼应，是对其积极贡献的回馈。

归根结底，它是清代赏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展现形式，同时，它亦是有清一代君臣联系交往的重要方式，与君臣诗歌唱和等活动共同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注释：

[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九十六。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页 271，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
[3]《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4]《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六。
[5]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页 49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清）马齐等编：《万寿盛典初集》卷一。
[7]《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奏为庆贺皇帝万寿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720-038。
[8]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奏为覆减筹备皇太后万寿款项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1038-014。
[9] 李鹏年：《一人庆寿　举国遭殃——略述慈禧六旬庆典》，《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3 期，页 40。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 271，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
[11] （清）阿桂等编：《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四。
[12] 《内务府庆典成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六十三辑，第 625 册，页 174-179，文海出版社。
[13]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户部等衙门奏为皇太后赏给年老人物件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046-022。
[14]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六。
[15] （清）阿桂等编：《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四。
[16] 《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奏呈遵旨照例按呼毕勒罕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进贡物折赏缎绸数目清单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497-269。
[17]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奏呈此次土司土舍等祝寿贡物遵旨照例折赏缎绸数目清单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 496-022。
[18]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奏请领取成做寿妇褂所用明黄素纺丝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 258-038。
[19]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奏为赏越南暹罗南掌三国使臣靴帽等项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604-022。
[20]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呈为皇太后寿辰拟赏亲王文武大臣等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294-055。
[21]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页 7，中华书局，1982 年。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页 790、791、79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3]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奏为皇太后赏给年老人物件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046-022。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页 85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5]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呈为皇太后寿辰拟赏亲王文武大臣等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294-055。
[26] （清）阿桂等编：《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四。
[27]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五。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页 787 ～ 7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9] 林基中编：《燕行录》第 51 册，页 441，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
[30] 林基中编：《燕行录》第 51 册，页 477-478，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
[31] 林基中编：《燕行录》第 51 册，页 485，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
[32]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九。
[33] （清）阿桂等编：《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五。
[34]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奏为皇太后万寿散给各处饽饽桌张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 05-0194-028。
[35] 李鹏年：《一人庆寿　举国遭殃——略述慈禧六旬庆典》，《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3 期，页 37。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页 844-84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页 86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8] 李鹏年：《一人庆寿　举国遭殃——略述慈禧六旬庆典》，《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3 期，页 37。
[39]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奏为传办九江关瓷器停办恳准其核实报销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奏案》，档号 05-1041-057。
[40] （清）马齐等编：《万寿盛典初集》卷十九。
[41] 实际支用布匹数量较此为多，因为乾隆皇帝增加了不同年龄段人员的赏项。
[42] 《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奏报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一至十四日赏赐缎匹数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 186-021-1。

[43]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奏报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五至三十日赏赐银两缎匹人参数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 186–047。